学术专论

“外人回心向之”？
——庄士敦与溥仪“出洋之议”

贾　盼

[摘要] 1919年经旧官僚李经迈推荐，英国人庄士敦成为逊帝溥仪的英文师傅。该教育计划牵涉一项过去罕为学界注意的溥仪“出洋之议”，庄士敦本质上是替李经迈等帝制派争取英国援助，转行君主宪政的中间人。然而，英国当局虽积极占据英文师傅职位，借谋维持在华威望，却并不接受溥仪戴皇帝头衔出洋游历，以免引起外交争端。庄士敦与英方立场一致，并试图促成清室整顿宫廷，主动放弃优待，缓和帝制存于共和的矛盾。这些主张不仅为竭力维持优待、阻挠溥仪离宫的清室王公大臣所不容，也令遥控他的实际雇主李经迈束手无策，“出洋之议”的走向最终面目全非。

[关键词] 庄士敦　溥仪　李经迈　“出洋之议”

[中图分类号] K25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4）－01－0126－011

有关溥仪出洋游学的问题，早有议论迹象。辛亥前夕，与庆亲王奕劻关系亲近的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曾与驻日公使汪大燮密谋，请摄政王载沣“奉皇上赴英美求学”，由奕劻“当国”，这一耐人寻味的“救国之策”，被载沣当面否定。[①] 清帝逊位后，奕劻又向内务府大臣绍英提及，将来宜为溥仪进西学，“出洋留学”，“始堪自主”。[②] 溥仪晚年在传记《我的前半生》中指出，1919年清室聘请庄士敦（R.F. Johnston）时，王公大臣再次提及“出洋的事”。[③] 巧合的是，1920年外报披露的溥仪出洋游历计划，恰好包括“洋师傅”庄士敦等“扈从”。中文报界据此加以悬揣，有溥仪出洋声势浩大，“仍具帝王气象”，“别有计划”之说，[④] 又有出洋乃“避复辟暗潮”的反调，[⑤] 虚实难辨。本文通过检视庄士敦供职清室期间对溥仪出洋事的穿针引线，试对该问题的幕后隐情作一探讨。

[收稿日期] 2022-10-24
[作者简介] 贾盼（1991—　），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上海 200241，jia-pan@outlook.com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2106010177）资助。

① 文明国编：《唐文治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62页。
②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上，1913年9月27日，中华书局，2018年，第240页。
③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7年，第99页。
④ 《宣统游学》，《新闻报》1921年3月9日，第2版。
⑤ 《宣统出游感言》，《时报》1921年2月28日，第2版。

一、“出洋之议”与英文师傅

1919年2月，庄士敦与民国内务部、清室内务府签订合同，成为溥仪的英文师傅。该合同出台的前因，大致指向这样一种叙述：1917年丁巳复辟失败后晚清重臣李鸿章幼子李经迈提醒贝勒载涛，清室久据宫廷非长久之计，应尽快为溥仪进西学，“日后一旦有变，或出国留学，或到海外作寓公，都是极为有益的”。① 后李氏推荐故人庄士敦入宫授英文，经时任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出面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 N. Jordan）协商，水到渠成。事实上，从绍英的日记来看，徐世昌曾于1918年3月先举荐美国人丁嘉立（C.D. Tenney），并谓内务府此事“具有深意，当此时局，似宜早办”,② 后不知何故作罢。徐再推荐精通多国语言的辜鸿铭，被清室王公以辜不熟悉“古代礼仪”回绝。③ 最后这个任命才落到庄士敦手中。

辛亥后李经迈避居英租威海卫租借地时，身为华务司的庄士敦予以招待。二人颇为投缘，认为共和不适中国，“对革命（或者对民国肇建）有着相同的看法”。④1918年11月26日，在沪休假的庄氏与李经迈在一个晚宴上意外重逢。时值欧战停火，作为协约国一员，中国各省机关商民悬旗庆祝。原本庄氏计划沪上庆祝活动后便返威复职，因李经迈的一番密谈，庄氏宦途峰回路转。

据与李氏家族有姻亲关系的刘体智所撰《异辞录》，李经迈提议为溥仪进西学，似有迹可循。李氏英文流利，曾任清廷出使奥地利大臣。1910年载涛赴日本及欧美多国考察陆军期间，“李侍郎相为之通译”。据称李氏“途中怂恿贝勒，联络邦交，以为牵制之计”。访晤华府时，美外交大臣提议“曷不疏请幼主游学于欧美，以为变政之计”，⑤ 这或许是丁巳复辟失败后李氏鼓动载涛为溥仪进西学的远缘，上文徐世昌最早推荐的师傅人选恰好也是美国人。更为蹊跷的是，与李氏往来密切的沪上遗老郑孝胥，在1917年8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宣统有出洋之议，欲以李季高（李经迈）及余随扈”,⑥ 十几日后，李氏又来“谈皇帝出洋游历事”。⑦ 此时正值丁巳复辟失败后处置清室的敏感时期，李氏所谈“皇帝出洋游历”与其后来物色英文师傅有何关系？

参看徐世昌以及绍英的记述，1917年11月8日，徐氏宴请世续等内务府官员及陈宝琛、朱益藩等师傅,⑧ 场面可谓隆重。次日，世续禀告载沣，段祺瑞探问“皇上出洋留学之事”。世续认为，后宫贵妃不愿送溥仪出洋，“须俟圣学较深之时，先在京学习外国文字，然后始能议及出洋留学也”，而载沣担心民国“有取销优待之意”，吩咐“缓商”。⑨ 载沣的反应证明清室曾应允送溥仪出洋留学，这应是郑孝胥所闻“出洋之议”。从时间上看，1918年初徐氏推荐英文师傅，极可能是载沣对“出洋之议”的松口妥协。至于“出洋之议”是否系丁巳复辟失败后段祺瑞等民国政要对清室的秘密处置，还有待考证。但徐世昌及李经迈试通过“出洋之议”外争强援，归政于清的意图非常明显。

---

① 爱新觉罗·溥佳：《清宫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2页；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第88–89页。

②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上，1918年3月19日，第397页。

③ 吴远思编译：《辜鸿铭信札辑证》，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97页。

④ R. F. Johnston to H. Warren, May 21, 1923, T. Loveday Papers, Oxford University: Magdalen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MC: 306/C2/5.

⑤ 刘体智：《异辞录》卷4，刘笃龄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第224–225页。

⑥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7年8月8日，中华书局，1993年，第1679页。

⑦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7年8月26日，第1681页。

⑧ 吴思鸥等点校：《徐世昌日记》第2册，1917年11月8日，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495页。

⑨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上，1917年11月9日，第379–380页。

民初前清旧官僚遗老酝酿的复辟活动中，徐世昌及李经迈是活跃人物。1917 年 1 月，于上海、青岛等地活动的遗老升允，东渡争取日本寺内正阁扶植清室，出发前夕升允与日人远藤文雄、森山少将的会面中都有李经迈的身影。升允到日本活动期间，曾任驻日公使的陆宗舆也“赴日本商复辟事”，据传徐世昌乃幕后主谋之一。[①] 升、陆二人的游说，最后均未得到日本方面的积极回应。[②]

据庄士敦就 1918 年 11 月 27 日与李经迈密谈向英国提交的备忘录，李氏与徐世昌当时又拟靠拢英国，仿行君主宪政：

> 他（李经迈）首先指出……帝制派（the monarchist party）背后势力树大根深……当下政府几位要员（包括总统）私下都属于（帝制派），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有利时机，对外宣布对帝制的同情。然而，帝制派亦意识到，恢复旧的专制制度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他们相信，如仿行英国宪政体制，幼帝迟早可能重新登上皇位。[③]

庄氏称李经迈希望找一位英国人为溥仪灌输西学，“尤其是英国宪法史”，为共和转宪政做好准备。[④] 此事徐世昌曾与朱尔典私下达成默契，朱尔典应允推荐一位英国人。掌握李经迈物色英文师傅内幕的沪上遗老章梫，1919 年 1 月 18 日去函丁巳复辟骨干刘廷琛时，透露了更多信息：

> 事为侍郎（李经迈）与海（徐世昌）数四缄返，再由朱尔典（朱已自悔其辛亥所行之误）电询其政府允许……侍郎之意，欲使英人及欧洲各国，借此告悉我主人之英明，将来外人回心向之，与我有成，其用意至为深远。故侍以为必得侍郎助译，方能曲曲传达于外，他日外交一种事，即由此立其始基。公意以为然，即乞缄达陈朱两师傅，商于世相行之。此意未可与世相说破。[⑤]

按章氏描述，庄士敦充当宣传溥仪“英明”的传话人，“侍郎助译”“他日外交一种事”可能指代李经迈随扈出洋，联络邦交。章梫请刘廷琛通意陈宝琛、朱益藩，意在提醒聘任庄氏“用意深远”。这封信发出不久，沪上遗老中威望甚高的沈曾植，另与帝师梁鼎芬通气：“英为帝国，可借力，季高（李经迈）论亦尔。鄙意今着意此点，不可为外人道也。”[⑥] 结合两封密信来看，徐世昌及沪上遗老争取英国援助之意昭然若揭。而庄氏实为争取外援“与我有成”的中间人，在宫廷诸傅中间心照不宣。

章梫信中提醒提防世续，联系上文载沣及后宫对“出洋之议”颇为抵触，似乎清室核心权贵对结交外援多有顾忌。溥仪曾指出，世续“从丁巳复辟起，越来越泄气”。[⑦] 饶有兴味的是，1919 年初庄氏入宫前再次入沪被引荐给诸遗老时，也从李经迈处听闻世续“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Conservative），对每一次改革都阻挠。李希望他快点死！”[⑧] 由世续推及清室权贵，其维持优待的立场与遗老争取外交这一静一动的张力背后，存在一个无法绕过的矛盾，即溥仪关门做皇帝是否最好的维持办法。丁巳复辟善后期间徐世昌也曾提醒世续：“果使幼君安住宫中，则优

---

①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3 册，1917 年 1 月 13 日，第 1641 页。

②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学生书局，1985 年，第 182–189 页。

③ Memorandum by R. F. Johnston, January 25, 1919, FO371/3690. No.58909, London: National Archives.

④ Memorandum by R. F. Johnston, January 25, 1919, FO371/3690. No.58909.

⑤ 王益知：《庄士敦授读与康有为复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年，第 780 页。

⑥ 许全胜整理：《沈曾植书信集》，中华书局，2021 年，第 166 页。笔者认为，结合信中“庄君”称颂溥仪“圣明”以及“领事密相告语”来看，这封书信作于庄氏入宫（1919 年 3 月）之后。

⑦ 爱新觉罗 ·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 86 页。

⑧ R. F. Johnston to J. H. S. Lockhart, February 19, 1919, Papers of J. H. S. Lockhart, Edinburgh: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Acc.4138/10(e).

待一事，必可继续有效。”[①] 足见溥仪居宫禁于维持优待之意义。若清室权贵维持优待的态度不变，等于请英文师傅便是对“出洋之议”的最大让步。

而作为求助对象，英国对于“外交一种事”持何种态度，也决定着“出洋之议”的走向。综合英国外交部相关档案来看，上文章梫信中对朱尔典的好感，极有可能被其处理中国事务的圆滑所迷惑。欧战结束以后，朱尔典对华外交重点在于敦促北京政府促成南北和议，完成统一。其同意庄士敦入宫，目的在于提升战后英国在华影响力：“幼帝天资聪慧，将来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如由我们将他培养成才，大有裨益。”[②] 这句话深刻影响了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Balfour），外交部随后提醒殖民部，“这一职位应当掌握在英国人手中”。[③] 但有意思的是，朱尔典将英文师傅包揽给英国人，却并不看好清室复辟。

前述庄士敦备忘录结尾处，庄氏有意无意暗示：“我认为李经迈是对的，即民心厌倦共和……在我看来，共和与君主政体的问题并不是今天中国人民所焦虑的问题。他们会欣然接受任何形式的好政府。”[④] 对此朱尔典似乎不满，转发此备忘录时特意提醒英国外交部：

> 无论他（溥仪）的政治前景如何，我认为他不会成为中国的立宪君主，帝制派的梦想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可能的办法是，皇帝有汉族血统，他的祖母是汉人，他应该通过娶总统的女儿进一步强化汉族认同。但即便对汉人的情感作如此妥协，也很难令南方（革命党）接受满清复辟。[⑤]

朱尔典在外交部面前拆帝制派的台，其攥在手中培养溥仪的教鞭，充其量只是维持英国在华威望的筹码：由一个英国人培养未来可能左右中国政局的人物变得“亲英”。这种心理正如一位英国殖民部官员所说：“尽管庄士敦不会卷入任何政治阴谋，但他应该接受聘请，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很可能在某些中国人看来英国利益受损，尤其庄士敦有机会教授幼帝英国宪法史。”[⑥]

英国当局对清室复辟持坐收渔利的心态与清室权贵一味维持优待的立场，无疑均为“出洋之议”的阻碍。虽目前难窥“出洋之议”全貌，但李经迈曾表示“不打算猝然复辟”，需先为溥仪灌输西学，等待时机君临天下。[⑦] 可见李氏的擘画需观时而动，这样的不确定性加之中、英各派立场分化，其后续运作难免踵步荆棘。

二、“出洋之议”曝光后的各方因应

1919 年 2 月 22 日晚，庄士敦抵达北京车站，被徐世昌秘书倪文德接至北京饭店。此后倪成为庄、徐二人的联络信使。一同迎接庄士敦的刘体乾（“李经迈的亲戚”[⑧]）此后穿梭京沪之间，为庄士敦与李经迈送信。庄士敦传递极为机密的消息皆由刘口头转述，留在纸面交给英国外交部备份的书信，一则向英国当局提供宫廷见闻，二则向英方宣传溥仪之“英明”，代有心争取外援的遗老影响英方态度。

英国外交部相关档案中，现有庄士敦在宫廷期间（1919—1922 年）与李经迈 10 余封通信。其中第一年的 5 封书信主要关于溥仪学英文的进展，虽未明确提及出洋问题，但结合其他信息细究，仍可发现庄士敦代为疏通外交的蛛丝马迹。

---

① 文艺编译社编：《复辟始末记》上 ,1917 年 , 第 79 页。

② J. N. Jordan to Foreign Office, December 27, 1918, CO 521/19, CO.354.

③ 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December 3, 1918, CO 521/19, CO.354.

④ Memorandum by R. F. Johnston, January 25, 1919, FO371/3690. No.58909.

⑤ J. N. Jordan to Curzon, March 14, 1919, FO371/3690, No.95140.

⑥ Colonial Office Minute, August 2, 1919, FO371/3690, No. 110014.

⑦ Memorandum by R. F. Johnston, January 25, 1919, FO371/3690. No.58909.

⑧ R. F.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V. Gollancz, 1934, p.167.

1919 年 3 月 7 日，应朱尔典要求，庄士敦就入宫与溥仪见面情形提交了备忘录：“幼帝……对时事非常感兴趣，包括外国政治。他有一定的地理知识，向往旅行和探险。”① 此处话外之音，应是预闻“出洋之议”的庄士敦向英方释放溥仪欲寰球游历的信号。对此沪上遗老颇为振奋。3 月 9 日，章梫再函告刘廷琛，谓庄士敦“甚称‘主人英敏’”。② 在此前后，沈曾植与梁傅书信也提到：“庄君称颂〇〇（注：溥仪）圣明，领事密相告语，而外若与庄君无关涉者，此甚有味。”③ 到 7 月 14 日，庄士敦去信李经迈，谓经他提议，溥仪已向朱尔典及美国公使芮恩施（P. S. Reinsch）赠送了一份代表英文学习成果的礼物——用英文誊写的诗歌，并附上朱尔典复信。④ 由几年后芮恩施的回忆录中可知，庄士敦替溥仪赠礼前曾邀请芮恩施去宫中作客，这一系列的示好被芮恩施直白地解读道：

> 皇帝表现出了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对美国的友善；但是，我认为一再出现的被带到美国公使馆庇护的可能性，在他年轻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他看来，那里似乎是逃避一切恐惧和危险的避风港。⑤

值得注意的是，庄士敦有心为溥仪争取英、美公使同情，但对溥仪的教育问题及如何处理帝制与共和的关系，却与李经迈等人有根本分歧。

1919 年 7 月 17 日，庄士敦致李经迈及徐世昌长信一封，语气略重地表示，13 岁的溥仪被关在宫廷，既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也无法进行体育锻炼，为遥不可及的帝制复辟摧残一个儿童的身心健康是残忍的。信中庄士敦所谓即使牺牲象征皇帝尊严的“最后残余”，也值得将溥仪培养成“一位思想开明”的“君子”，⑥ 实则暗示徐、李二人考虑敦促清室放弃优待特权。据绍英描述，李氏向载沣转述庄士敦建议后，载沣“问出洋事”，⑦ 再无下文。载沣对庄士敦建议的反应，本质仍是唯恐优待动摇的敏感，而在庄士敦看来，维持优待特权实与溥仪出洋有种种妨碍。

1920 年 5 月，英国《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刊登了对离任回国的朱尔典的采访。针对外界十分好奇的溥仪近况，朱尔典形容溥仪“对外面的世界非常感兴趣”，“喜欢旅行”，⑧ 实则含蓄披露了“出洋之议”。当记者反问清室有无可能复辟时，朱尔典巧妙地表示溥仪并不支持复辟帝制，但可能与总统徐世昌的女儿订婚。这份采访登报后庄士敦有些紧张和不悦，于 1920 年 7 月 14 日致书李经迈。信中庄士敦怀疑李经迈授意朱尔典对外散播溥仪出洋消息，引起外人兴趣，庄士敦认为这种“宣传”操之过急：“暂时不宜公布任何可能引起共和派怀疑他或我们正试图以他的名义争取外人同情或博得西方国家好感的东西。”⑨

同时从庄士敦描述来看，李经迈筹划溥仪以大清皇帝名义出洋游历，随从包括李经迈、陈宝琛、庄士敦，另带“军人、骑兵、秘书和仆人，以及一位司仪（相当于总统的大礼官）”。预计花费 100 万元，包括沿途向外国皇室和其他名人献厚礼。对此庄士敦提醒有外交经验的李经迈注意，溥仪戴帝号出洋极为不妥：“英国或任何其他外国政府，都无法承认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国皇帝的存在，这很容易被理解为对民国的侮辱……新闻界可能会发表关于这位没有实权的皇帝和他可笑的司仪的文章。”庄士敦建议，溥仪应“隐姓埋名”地以满洲贵族的名义出洋，鉴于他婚期将至，最好于 1921 年 10 月出发，经暹罗、印度、波斯到欧洲，随后赴英国游历 4

---

① Memorandum by R. F. Johnston, March 7, 1919, FO371/3690, No. 95140.

② 王益知：《庄士敦授读与康有为复辟》，《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上，第 781 页。

③ 许全胜整理：《沈曾植书信集》，第 166 页。

④ R. F. Johnston to Li Ching-mai, July 14, 1919, enclosed in Papers of J. H. S. Lockhart, Acc.4138/10(e).

⑤ P.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George Allen & Unwin, 1922, p.378.

⑥ R. F. Johnston to Li Ching-mai, July 17, 1919, FO 371/3690, No. 128745.

⑦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下，1919 年 8 月 15 日，第 444 页。

⑧ “Imprisoned Boy Ex-emperor”, May 6, 1920, *The Daily Mail*, p.8.

⑨ R. F. Johnston to Li Ching-mai, July 14, 1920, FO371/5344, F2014/2014/10, No.521.

个月，在牛津大学“见识英伦博学者的风采”，再由美国经日本返回中国。①

此书信辗转被英国外交部递交国王乔治五世后，英王批注道：“如果这位青年（溥仪）来欧洲的话，他最好‘隐姓埋名’地旅行，并尽量少带随从。”② 这无疑是英方对帝制派争取外援的婉拒。结合溥仪曾说“反对我出洋的是怕我丢掉这个尊号，同情我出洋的也把出洋时机放在实在保留不了这个尊号以后”，③ 推想李经迈等人得知英方回复后，失望之余应无法接受溥仪微服去国。

令出洋事再起波澜的是，庄氏密报溥仪出洋计划的信送抵英外交部之前，④1920 年 8 月《每日邮报》已披露溥仪欲游历欧美，但碍于欧洲局势不稳未克成行。⑤ 如果说这一笼统简短的报道真假难辨的话，1920 年 12 月外报驻华记者濮兰德（J. O. P. Bland）刊长文将溥仪出洋计划和盘托出：

> 民国总统徐世昌（作为幼帝太保和坚定的帝制派，与幼帝情谊深厚）支持他（溥仪）明年在庄士敦、李经迈以及少量仆人陪同下微服游历欧美的提议。这件事和皇帝的婚事在宫中争论不休。按历朝惯例，他订婚的时间近在眼前，因此他若想实现出洋愿望，刻不容缓。⑥

濮氏注明他的消息源于 1920 年秋季登门拜访庄士敦，意识到事态不妙的英国外交部随即通知驻华公使艾斯顿（B. Alston）“提醒庄士敦注意濮兰德的轻率”。⑦ 但英方的补救为时已晚，濮氏另撰《待位之帝》（“An Emperor in Waiting”），⑧ 引起中文报界警觉西人视溥仪为“候补皇帝”，⑨《益世报》转译该文时，打出了复辟“果得大多数人之同意乎？”的副标题。⑩ 当时另有说法，云溥仪出洋乃“避复辟暗潮”，且民国“大有从旁赞助之意”。⑪ 迫于各方舆论，内务府出面辟谣：“幼帝年甫弱冠……目下实无远游外国之必要。”⑫ 庄士敦也投函《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辩称所谓溥仪出洋的报道，“反映了一些知名的中国记者的想象，纯属无稽之谈”。⑬ 私下庄士敦愤怒谴责濮兰德：“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蒙我’……你所说的一些事情，可能会让我在宫廷处境尴尬。”⑭

按濮兰德描述，对于英国建议溥仪微服出洋，徐世昌并无异议。而据庄士敦书信，李经迈似乎对借力英国感到灰心。1921 年 1 月 14 日庄士敦去函李经迈时提到，不久前徐世昌托载涛劝李氏出任驻英大使，被李“愤而拒绝”。⑮ 英国外交部官员坎贝尔（C.W. Campbell）阅读该信后批注道：“未进一步暗示逊帝游历欧洲的可能性”，⑯ 侧面表明李再未通过庄向英方释放出洋信息。

---

① R. F. Johnston to Li Ching−mai, July 14, 1920, FO371/5344, F2014/2014/10, No.521.

② Foreign Office to Clive, September 20, 1920, FO371/5344, F2140/2140/10.

③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 99 页。

④ 英国外交部显示接收庄士敦 1921 年 7 月 14 日书信的日期为 1921 年 9 月 1 日。

⑤ “Boy Ex−emperor of China Anxious to Visit U.S and Europe”, *The Daily Mail*, August 23, 1920, p.8.

⑥ J.O.P. Bland,“The Last Imperial Manchu”, *Asia*, Vol. 20, No.11, 1920, p.1052.

⑦ Foreign Office to B. Alston, January 4, 1921, FO371/5344, F3424/2014/10.

⑧ J.O.P. Bland,“An Emperor in Waiting”, *The Observer,* December 19, 1920, p.9.

⑨《外人眼光中之宣统》，《新华日报》（北京）1921 年 3 月 5 日，第 2 版。

⑩《宣统近况之外人论调》，《益世报》（北京）1921 年 3 月 16 日，第 2 版。

⑪《宣统出游感言》，《时报》1921 年 2 月 28 日，第 2 张。

⑫《清宣统帝出洋之不确》，《中美日报》1921 年 3 月 11 日，第 2 张。

⑬ “The Ex−emperor’s Rumored Foreign Tour”, *North China Daily News*, March 7, 1921, p.4.

⑭ R. F. Johnston to J.O.P. Bland, February 2, 1921, J.O.P. Bland Papers, University of Toronto: Thomas Fisher Rare Book Library, Box19:105.

⑮ R. F. Johnston to Li Ching−mai, January 14, 1921, FO371/6477, F945/945/10.

⑯ Foreign Office Minute, March 17, 1921, FO371/6647, F945/945/10.

从 1921 年 4 月 18 日庄士敦的一通私信来看，庄士敦认为将来出洋随“皇室访问”不无可能，[①]然而到庄士敦提议的出洋行期（10 月）前后，李仍居沪，“拒绝来京”，且将来年新年与庄士敦会面的地点选在泰安或天津。[②]

与李经迈的消极相比，清室权贵阻挠溥仪出洋的势头依旧强硬。1921 年 11 月，康有为弟子徐勤来京拜访绍英，“云南海之意，皇上急宜出洋游学，以免南方革党来时，有种种危险”，绍英回复“阻碍尚多”。[③] 徐勤另携其师书信一封拜访庄士敦，庄士敦随后向李经迈汇报时虽未提及徐勤谈话细节，但透露端康皇贵妃和载沣坚决阻挠溥仪出洋。[④] 可以说到 1921 年，清室权贵对“出洋之议”拒作进一步妥协的态度，已然明确。

三、“最终记录”与庄士敦辞职

清室辟谣出洋计划不久后着手为溥仪筹备婚事，在宫廷笼罩的维持现状气氛中，溥仪反而变得躁动。用庄士敦的话说，宫廷“保守派”眼中他这样的“危险人物”，“把新思想灌输到了皇帝的脑袋 , 让他焦躁不安 , 不像以前那么容易控制。他越来越渴望见见世面，走出他那可怜的牢笼”。[⑤]

溥仪胞弟溥杰曾提到，当时溥仪“觉得自己被关进鸟笼，他要出去”。[⑥] 而溥仪的目的地就是庄士敦的母校牛津大学，因为“庄士敦在一次闲聊中提过让溥仪到牛津大学学习”。[⑦] 庄士敦也发现，自 1921 年 9 月底溥仪生母自尽后，溥仪便越来越渴望出洋，“并已经有所行动”。[⑧] 溥仪曾借询问绍英民国政府支付岁费情况，暗示“因筹备出洋，应预筹经费”。[⑨]

对于溥仪的谋划，庄士敦依然认为须以修正《优待条件》为前提。1921 年 11 月 9 日，庄士敦函告李经迈，如果反对出洋的意见太甚，不如敦促清室迁宫。[⑩] 而英公使艾斯顿 1922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当时庄士敦对溥仪渴望出洋的雄心壮志并不反对，但私下“已经多次建议皇帝遵守 1912 年的《优待条件》，迁居颐和园。如果他愿意的话，在那里可以向中国人民发表宣言”。[⑪] 此“宣言”即放弃《优待条件》，等于拱手交出清室权贵维持优待的根据。艾使的报告颇能解释上文庄士敦自道他成为宫廷“危险人物”的内情。

到 1922 年初，李经迈通过庄士敦得知溥仪已经决定放弃优待，遂提醒庄士敦“未彻查皇室财产前不宜这样做”。[⑫] 然而溥仪命李氏北上协助清产后，李氏私下请示徐世昌：“清产一事，我应否就差”，徐回复：“非其时，可不来。”[⑬] 李遂致书内务府官员耆龄，“词颇油滑”，[⑭] 拒不出山。据庄士敦描述，当时李经迈已变得“极度悲观”，表示只要载沣继续支持内务府，任何宫廷改革

---

① R. F. Johnston to J. H. S. Lockhart, April 18, 1921, Acc.4138/10(g).

② R. F. Johnston to Li Ching−mai, enclosed in B. Alston to Curzon, November 3, 1921, FO371/7973, F14/14/10.

③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下，1921 年 11 月 6 日，第 540 页。

④ R. F. Johnston to Li Ching−mai, November 9, 1921, FO371/7973, F15/14/10.

⑤ R. F. Johnston to Li Ching−mai, enclosed in B. Alston to Curzon, November 3, 1921, FO371/7973, F14/14/10.

⑥ 爱德华·贝尔：《中国末代皇帝》，靳革，黄群飞译，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 年，第 71 页。

⑦ 爱德华·贝尔：《中国末代皇帝》，第 71 页。

⑧ R. F. Johnston to J. H. S. Lockhart, November 5, 1921, Acc.4138/10(g).

⑨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下，1921 年 10 月 20 日，第 534 页。

⑩ R. F. Johnston to Li Ching−mai, November 9, 1921, FO371/7973, F15/14/10.

⑪ B. Alston to Balfour, June 14, 1922, FO371/7973, F2423/14/10.

⑫ R. F. Johnston to Li Ching−mai, June 8, 1922, FO 371/7973, F2423/14/10.

⑬ 王庆祥、萧立文校注 , 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 542 页。

⑭ 裘陈江整理：《耆龄日记》，1922 年 5 月 16 日，凤凰出版社，2020 年，第 185 页。

都不可能实现。[①]

李经迈反对溥仪放弃优待，却无力介入内廷事务。加之 1922 年初直奉两派矛盾激化，直系吴佩孚不满奉系推梁士诒上台组阁，徐世昌的总统地位岌岌可危，这些因素都让意欲摆脱宫禁的溥仪坐立不安。庄士敦也预料，"如果南方党北上掌权"，溥仪将处境危急，"不得不出洋"。[②]至 6 月 1 日徐氏通电引退，3 日溥仪召庄士敦入宫，密议前往英使馆发表放弃优待宣言并出洋游学，这一为英国招致批评干涉中国内政的请求，被庄士敦断然拒绝。出宫后庄士敦赴电报局急电李经迈来京，4 日李回电："务必持重，不可轻举。"[③]

向沪上乞援失败后，孤悬宫禁的庄士敦感到无法再与李经迈合作。此次庄士敦颇费一番口舌才阻止溥仪，难保他不会故技重施。据一位英使馆官员日记，当时庄士敦唯恐溥仪向英使馆寻求庇护："英国政府对溥仪并不感兴趣……庄士敦可能丢了他的工作。"[④]6 月 8 日庄士敦再次去信李经迈，煞有介事地列举溥仪决定放弃优待的理由，并未承认自己的鼓动作用。针对不久前李氏指示放弃帝号是"不明智的"，难以再图大计，庄士敦称《优待条件》不仅是个空壳，还是民众眼中共和失败的根源。庄士敦另提到，朱尔典曾私下表示，溥仪"有朝一日学业有成并完成出洋旅行后，可能被选为总统"，但庄士敦认为只有溥仪放弃帝号等特权，才能在帝制派之外广收人心。[⑤]在这封通篇提醒李经迈抱残守缺《优待条件》是对共和原则挑衅的书信结尾，庄士敦写道这将是他供职清室的"最终记录"。[⑥]此后直到溥仪被驱逐出宫，虽庄士敦并未辞职，但英国外交部档案中似再无庄士敦与李经迈书信。所谓"最终记录"应是庄士敦不愿再受李遥控的婉言。

供职宫廷最后两年，如胡适所说，"庄君主张取消优待条件最力；清理财产，整顿颐和园收入，皆他所主张"。[⑦]这是庄士敦一贯认为溥仪的出路所在，只不过对于整顿宫廷的结果，庄士敦内心也不作乐观估计。

1923 年初，庄士敦函告英国当局，即便溥仪婚后不再上学，他仍愿以顾问角色留在宫廷，一旦溥仪"恢复了政治权利，那么他对英国的好感将至关重要"。[⑧]庄士敦自表身价，实则是迷惑英国当局立足在华利益，允许他继续伴驾。而几日后在一封私信中，庄士敦对溥仪的前景作了截然不同的观察："整个宫廷系统随时可能崩溃，我也可能失业。"[⑨]对于清室大厦将倾，庄士敦难掩忧虑，但在信的结尾，他却颇有兴致地提及溥仪大婚时赏赐他"头品顶戴"："我不能得到更高的顶戴了！满清给我的礼遇比殖民部更好！"[⑩]结合耆龄曾形容庄士敦被赐二品顶戴时已"喜形于色，托买珊瑚顶珠"，[⑪]庄士敦耽于逊清荣誉对其认识到宫廷积重难返、帝制业已被革命洪流淹没，可谓颇具戏剧性的反讽，这种两面也是庄士敦后期在溥仪出洋事上虚与委蛇的写照。

1923 年 5 月，溥仪心血来潮想要一张英国王储威尔士亲王签名的照片，[⑫]庄士敦未惊动英国外交部，而是私下向他在牛津马格德林学院读书时的院长沃伦（H. Warren）请援。沃伦是威尔

---

① R. F.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p.322.

② R. F. Johnston to J. H. S. Lockhart, January 15, 1922, Acc.4138/10(h).

③ R. F. Johnston to Li Ching−mai, June 8, 1922, FO 371/7973, F2423/14/10.

④ L. B. Raymond, *Tutor to the Dragon Emperor,* Sutton Publishing, 1999, p.89.

⑤ R. F. Johnston to Li Ching−mai, June 8, 1922, FO 371/7973, F2423/14/10.

⑥ R. F. Johnston to Li Ching−mai, June 8, 1922, FO 371/7973, F2423/14/10.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198 页。

⑧ R. F. Johnston to Colonial Office, January 12 ,1923, FO371/9216, F690/690/10, No.9974/23.

⑨ R. F. Johnston to J. H. S. Lockhart, January 17, 1923, Acc.4138/10(i).

⑩ R. F. Johnston to J. H. S. Lockhart, January 17, 1923, Acc.4138/10(i).

⑪ 裘陈江整理：《耆龄日记》，1922 年 1 月 11 日，第 158 页。

⑫ 即后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1894—1972）。

士亲王 1912 年入读牛津的照料人，借此机会庄士敦故作姿态地询问是否可将英文欠佳的溥仪破格录取，并怂恿沃伦出面与英国外交部周旋。讽刺的是，庄士敦在结尾写道：

> 我非常担心出洋游历或寓居英国的计划会化为泡影。由于政治和其他原因，皇帝目前不可能出洋，政治气氛也没有好转的迹象。如果偏激的共和派一意孤行，他迟早会被剥夺所有剩余的特权；他们将尽最大努力阻止他出洋，声称存在复辟阴谋的危险。如果他真的实现了出洋愿望，我不能肯定那时还会留在他身边。①

在这里庄士敦提前回答了将来是否“扈从”出洋，并极具先见之明地言中了溥仪的政治命运。庄士敦虽预料溥仪出洋窒碍重重，却并不愿戳破他已无法协力溥仪出洋的尴尬。

1923 年 10 月，郑孝胥父子在遗老中“倡议报效皇上出洋游历经费”。按郑氏谋划，溥仪经日本至欧美游历后于瑞士留学，所带人员除后妃及仆人，明确包括庄士敦。② 其子郑垂入京接触庄士敦后，“庄允将大意即告英公使，并作书以告伦敦”。③ 及至郑孝胥掌内务府印钥，1924 年 5 月庄士敦被封为管理颐和园大臣。庄士敦一度试图对园中财产开源节流，“逐步为迎接皇帝迁出紫禁城做准备”。④ 溥仪也有携后妃频赴颐和园游玩的举动，被传“为圣意渐图远游张本”，⑤ 引起宫廷人士紧张。时任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函告遗老罗振玉溥仪游园情形时，描述得惊心动魄：“行者皆不能及，随从者惟庄而已”，⑥ 大有溥仪趁左右不备直奔使馆区的意味。原本罗氏自庄士敦鼓动溥仪裁撤太监，便认为“以后仍有动作，不外撤号及出游二事”，⑦ 接信后罗氏叮嘱王国维速联络陈、朱二傅挽回局面，后陈宝琛向庄士敦“陈说利害”，庄士敦“自知不合”，保证“决不致有他事”，而彼时寓居天津的升允“言庄事非痛陈不可”，也联名铁良等遗老上疏。⑧

庄士敦经营颐和园技穷之时，1924 年 10 月底，冯玉祥部趁第二次直奉战争间隙发动政变，于 11 月 5 日驱逐溥仪出宫。逼宫事件后，溥仪左右除了主张争取恢复优待，也有人主张出洋避祸，其中金梁认为“赴英为宜”，⑨ 罗振玉则倾向于赴日。⑩ 溥仪注意到“庄士敦已经不宣传去伦敦做客”。⑪

事实上，冯军政变不久后溥仪曾与郑孝胥议定托庇荷兰使馆，“庄士敦以为可，而避有与谋之嫌”。⑫ 逼宫当天，庄士敦向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R. Macleay）报告宫廷政变，麻克类鉴于“众所周知日本政府对幼帝感兴趣”，⑬ 特意邀日使芳泽谦吉一道，前往外交部与王正廷交涉，有心将清室问题甩手日本。得到王氏保证不会危及溥仪人身安全后，麻克类便决定不再“进一步干预此事”。⑭ 因而 11 月 29 日，庄士敦载溥仪进入东交民巷寻求庇护时，非常识趣地先单独去日本、荷兰使馆分别交涉，不遇二使后方才探问麻克类，得到英使馆无接收政治难民先例的答复。另外，与清室过从甚密的军阀张作霖，曾于 11 月 27 日通过庄士敦与麻克类密谈，暗示麻克类为溥仪的事“火中取栗”，为恢复清室优待张目。对支持帝制不感兴趣的麻克类，未做出

---

① R. F. Johnston to H. Warren, May 21, 1923, T. Loveday Papers, MC: 306/C2/5.

②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1923 年 10 月 8 日，第 1965 页。

③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1923 年 12 月 7 日，第 1973 页。

④ Memorandum by R. F. Johnston, 1931, FO 676/124, F236/1/10.

⑤《陈夔龙谏阻出洋折》，《益世报》（北京），1925 年 8 月 9 日，第二张：第六版。

⑥ 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616 页。

⑦ 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581 页。

⑧ 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618−621 页。

⑨ 金梁：《遇变日记》，吴景洲：《故宫五年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年，第 124 页。

⑩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 130 页。

⑪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 141 页。

⑫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1924 年 11 月 5 日，第 2025 页。

⑬ R. Macleay to A. Chamberlain, November 8, 1924, FO 371/10917, F349/2/10, No.703.

⑭ R. Macleay to A. Chamberlain, November 8, 1924, FO 371/10917, F349/2/10, No.703.

积极回应。[1] 英国外交部大臣奥斯丁·张伯伦（A. Chamberlain）随后指示麻克类，不能让英国政府被视为“反对民主运动的没落帝制的支持者”。[2]

英国当局与清室划清界限，成为庄士敦无法继续伴驾的前奏。溥仪被驱逐出宫禁足醇王府时，已有评论直指庄士敦“有勾通外人加以干涉之形迹”，[3] 这种“卑鄙的攻击”，[4] 令庄士敦有所警觉。至溥仪托庇日使馆，庄士敦代徐世昌及康有为等人传信，建议先待冯玉祥等人擅自修改《优待条件》一事得到妥善解决。[5] 这与溥仪“唯谋出洋游学”，[6] 已然不对调。经与罗振玉密谋，1925 年 2 月 23 日晚，溥仪在日本便衣警察的护送下，乘坐火车前往天津日本租界。

溥仪的秘密行动令庄士敦惊愕之余深感失望，他向英国外交部汇报溥仪赴天津详情时，认为去职的时机已到：

> 激进党和布尔什维克派的报纸，正在伺机等候任何可以煽动反对英国的借口，如果我此时去天津找他（溥仪）或者和他去日本，他们会认为这是“帝国主义”的英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联手在中国制造事端的好证据……现在他已经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我认为是时候我们要分开了。然而，也许我不必着急做结论。[7]

在英使馆写这份备忘录时，庄士敦因接到溥仪召其前往天津的电话，故结尾对辞职还有些许犹豫。代理驻华公使白慕德（C. M. Palairet）则含蓄建议，这是中断与溥仪联系的“最佳时机”。[8] 几日后，庄士敦在一封私信中如释重负地写道：“现在可以离开皇帝了，这倒使我松了一口气。”[9] 当时舆论盛传溥仪将东渡，庄士敦也以为溥仪抵达天津后“很容易坐一艘日本船去日本或大连”。[10] 未料 3 月 5 日英国驻日公使仪礼（C. Eliot）致电白慕德：“日本政府希望庄士敦私下提醒皇帝，如果他去满洲或日本，会令他们非常为难。”[11] 庄士敦方才知晓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自溥仪进入日使馆就视其为不速之客。3 月 9 日，庄士敦动身前往天津，向溥仪传达日方劝告的同时提出辞职。

为了更加正式地宣示离职，回京后庄士敦去信李经迈，痛陈溥仪迟早会成为身边阴谋复辟的旧官僚遗老的牺牲品，而他若继续陪伴溥仪，只会被革命派渲染成复辟分子中“‘帝国主义’英国的代理人”。另外，庄士敦不再掩饰地道出溥仪托庇使馆区期间并未博得外人好感的尴尬事实。当时庄士敦为溥仪安排了许多茶会和宴会，以便熟悉主要公使团人员，但效果令人汗颜：

> 我确实认为游历欧洲会为他（溥仪）赢得有影响力的外国人的同情和善意……但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他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欠佳。不像皇后（征服了每个人），他缺少天生的高贵和优雅，陌生人无疑都能看到他没有这些优良品质。他缺乏对服装的品位也令我哭笑不得。[12]

言下之意，溥仪在东交民巷的名声不是“英明”，而是出尽洋相。庄士敦这封露骨的去职信，对于李经迈争取“外人回心向之”的初衷，是个讽刺的收场。

---

① R. Macleay to A. Chamberlain, December 8, 1924, FO 371/10917, F349/2/10, No.773.

② A. Chamberlain to R. Macleay, February 4, 1925, FO371/ 10917, F357 /2/10, No. 87.

③《废帝号为当然之办法》,《京报》（北京）1924 年 11 月 7 日，第 2 版。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 196 页。

⑤ Memorandum by R. F. Johnston, February 24, 1925, FO371/10918, F1265/2/10.

⑥ 金梁：《遇变日记》，吴景洲：《故宫五年记》，第 121 页。

⑦ Memorandum by R. F. Johnston, February 24, 1925, FO371/10918, F1265/2/10.

⑧ C. M. Palairet to Foreign Office, February 26, 1925, FO371/10918, F1265/2/10, No.132.

⑨ R. F. Johnston to J. H. S. Lockhart, February 28, 1925, Acc.4138/10(k).

⑩ Memorandum by R. F. Johnston, February 24, 1925, FO371/10918, F1265/2/10.

⑪ C. M. Palairet to A. Chamberlain, March 26, 1925, FO371/10918, F1817/2/10, No.1.

⑫ R. F. Johnston to Li Ching−mai, March 21, 1925, CO521/27, CO. 18339.

四、结语

溥仪“出洋之议”寄托着李经迈等旧官僚试图借英国，改共和转行君主宪政的希望。然而，英方拒绝接待溥仪以大清皇帝头衔出访，表明民初清室《优待条件》中仍存不废的帝号，在当时的国际外交秩序中名不正言不顺。就国内舆论而言，1921 年溥仪出洋问题引发哗然，一则时评指出，溥仪“以皇帝资格与外人周旋”不妥，应除尊号，“溥仪可出洋，宣统不可出洋也”，[①] 也点明溥仪帝号与出洋问题，难以兼容。推动“出洋之议”的李经迈，对溥仪去尊号的态度，在 1922 年指示庄士敦放弃优待“不明智”之语中显而易见，到幕后支持出洋计划的徐世昌下台，热心放洋游学的溥仪冒然尝试进入英使馆，种种变故令“出洋之议”的中间人庄士敦，陷入无力应付局面的空前窘境。至溥仪被驱逐出宫托庇日使馆，英方注意避免引起支持帝制的猜忌，庄士敦除被迫辞职别无他法。溥仪的出洋问题与维持优待难以理顺的矛盾，是民初帝制与共和畸形共存的一隅。

References

Behr, Edward. *The Last Emperor*, Bantam Books, 1987.

Hu Pingsheng. *Minguo chuqi de fubipai* (The restoration party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aibei: Taiwan xuesheng shuju, 1985.

The Enlistment of Foreign Diplomatic Support? R. F. Johnston and “Pu Yi’s Foreign Tour Scheme”

JIA P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ia-pan@outlook.com)

Abstract: In 1919, an English man R.F. Johnston became the English tutor of Ex-emperor Puyi through the recommendation of a former Qing Dynasty mandarin Li Ching-mai. This educational plan concerned a so-called “Pu Yi’s Foreign Tour Scheme”, which was rare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past. Essentially, Johnston was destined as the middleman by Li Ching-mai and other monarchists to enlist British government’s support in restoring Pu Yi back to the throne as a constitutional ruler of China. However, although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actively monopolized the position of English tutor for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British prestige in China, they did not accept Pu Yi’s travelling abroad under the title of Emperor to forestall any diplomatic disputes. Sided with the British, Johnston advised Pu Yi to mitig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onarchy and republic through taking up residence at the Summer Palace and also proactively giving up favorable treatment. Not only were these views rejected by the aristocrat and officials of Qing court who were stubbornly holding onto the favorable treatment and persisting on Pu Yi’s remaining in the palace, they also left the behind-the-scene employer Li Ching-mai in a difficult position. “Pu Yi’s Foreign Tour Scheme” in the end turned out to be unrecognizable.

Keywords: R.F. Johnston, Pu Yi, Li Ching-mai, “Foreign Tour Scheme”

① 《宣统出洋说》,《时报》1921 年 2 月 14 日，第 2 版。